

南方局党史研究 论文集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四川省中共党史学会

重庆市中共党史学会

重庆出版社 1992年·重庆

编

5.71

3

南方局党史研究论文集

重庆出版社

1993年·重庆

(川)新登字010号

责任编辑 杨亚平
封面设计 王晓珊
技术设计 忠 凤

南方局党史研究论文集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5 插页2 字数166千
1993年9月第一版 1993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 500

ISBN 7-5366-2389-5/K·134

定价：3.50元

南方局的历史丰富了 党的历史宝库^①

——记宋平同志的讲话

《南方局党史资料》丛书的出版，是党史工作的一项重大收获。对它的出版，我表示衷心的祝贺！

今天参加这个出版座谈会并与当年共事的许多老同志重新聚会，感到特别高兴。

《南方局党史资料》以及《南京局党史资料》的出版和《长江局党史资料》的即将出版，都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这一段历史在我们党的整个历史中间是非常重要、非常光辉的一页。我们党经过长期的斗争，在遵义会议之后，更加成熟，领导全国人民，在最艰难的时期，通过统一战线，通过武装斗争，一直到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接着进入解放战争时期。没有这一段历史，中国革命不可能取得这样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也不可能取得这样大的发展，成为今天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党。所以，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在当时有两个战场：一个解放区，在前线进行武装斗争，是主战场；另一个战场在大后方，在国民党地区，也是一个重要战场。在后一战场，我们党进行了多方面的工作：建立党的各

① 这是宋平同志1990年6月25日在北京召开的《南方局党史资料》丛书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标题系本书编者所加。

级组织，成功地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各阶层人士，带动广大群众，支持抗日战争。可以说，没有这一条战线，没有大后方这个战场的大量工作和取得的成就，也很难取得前方军事的胜利。因为在当时，第一要发动群众，第二要跟投降派和顽固派进行斗争，这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在这条战线中，长江局、南方局、南京局在党中央的领导和周恩来同志的亲自主持下，作了非常有成就、非常出色的工作，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不论是党的建设，从秘密工作到公开工作，统一战线工作，从基层到上层；文化战线的工作——夏公（指夏衍同志）今天也来了，还有徐冰等同志，都作了很多工作——在南方局指挥下，各条战线的工作都是非常出色的。这些经验，在党的历史上确实非常宝贵。把这些经验按照历史本来面目加以整理，加以提炼，就会丰富我们党的历史宝库。这对于进行党的优良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对于培养后代都是非常宝贵的财富。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重庆市委、重庆市政府、重庆出版社非常积极认真，作了许多工作，我在这里一并向大家表示感谢。

再过几天，我们党就要度过第69个生日了。我特别回想到南方局时期，当时党的生活和学习给我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南方局机关的整风学习和平时学习是在周恩来同志、董必武同志，和今天在座的孔原同志的亲自领导下进行的。这些学习非常认真。几位领导同志亲自参加学习，和大家一起讨论。南方局对思想政治工作十分重视，对整风学习、平时学习，对一般同志的文化学习也很重视。党的生活非常严谨，从周恩来同志起，都参加党的小组会，过严格的党的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集体，从南方局机关到新华

日报社是个战斗的集体，思想高度一致，纪律十分严格。通过学习，受到教育，大家提高了政治思想水平，加强了党性锻炼，在当时那种复杂艰苦的环境里，在重重包围中，没有出过逃兵。这和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和严格的党的生活是分不开的。在纪念党的生日前夕，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确实很值得总结。童小鹏同志叫我写一写对当年的回忆。我当时作为南方局的学习秘书，是应该写的。当时我们都还很年轻，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领导和教育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党性锻炼、政治思想觉悟的提高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终生受益，永志不忘。对这一段学习生活的历史应有所补充。我还没有完成这个任务。

党史是党和人民群众 共同奋斗的历史^①

——胡乔木同志在重庆的谈话

一、南方局的工作很出色，南方局党史很重要

乔木同志说：南方局这部分党史是很重要的。没有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没有抗战时期那么一种局面，团结了大后方那么多的人，把抗战坚持了下去，还保存了我们党的一大批精干力量；没有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没有后来解放战争时期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形成那样强大的第二条战线。那时南方局的工作很艰苦啊！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是很出色的。没有南方局在大后方进行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就很难把当时在国民党区域的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团结在我们共产党的周围，后来我们建立新中国的情况就会不一样，就没有今天这样的格局。因此，可以说，南方局的统战工作从一个方面的意义上讲，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南方局的统战工作是多方面的，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有上层的也有下层的，为我们党团结争取了许多的朋友。应该从多方面收集材料。在“皖南事变”前后一段时间，国际上

① 这是胡乔木同志1988年12月到四川视察途经重庆时，就党史的有关问题的一些谈话。记录整理出来后，经乔木同志审阅修改，曾在《红岩春秋》创刊号上发表。

的朋友去延安的不多，只有斯诺、斯特朗等少数几个人。但南方局在这方面做的工作很多。1944年，中外记者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到延安之后，国际朋友到延安的就多了。这些人能去延安，有的还和我党建立了友好关系，这都与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有直接关系，是南方局、办事处的同志们在这里长期艰苦工作的结果。

二、党的历史是党的组织、党员和人民群众共同斗争的历史，要从多方面来反映

乔木同志说：我们党的发展历史，包括南方局的发展历史，一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斗争；二离不开朋友们的合作；三离不开国际无产阶级和国际友人的支持。南方局当时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工作，没有他们的帮助与合作是不行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南方局的历史，是党的组织、党员和革命群众共同斗争的历史。这不是说南方局领导机关的工作不重要，而是说不能离开人民群众和国内外朋友们的共同斗争。过去搞党史时这些方面不重视，只侧重在领导同志的言行，这是不够的。当年南方局的领导同志，周总理、董老、叶帅等等都已经去世了，能复活当然最好。即使真的复活了，他们年事已高，恐怕也谈不了多少。南方局的史料仅从一个方向去找不行，还可以走其他的路，不要限于一个方向。历史是立体的，不是一条线，要从多方面来反映。南方局的历史不仅是从南方局本身来反映，资料是很丰富的，可以发掘的材料就很多。比如当时八路军办事处就与许多外国人有往来，有许多外国人著的书我们还没有翻译过来。许多与我们保持联系、与我们合作的人，如宋庆龄，如民盟的领导人，如文化界的朋友们，他们的活动是在党的影响下进行的，体现了党的领导，是党史的一部分。党史与现代革命史，与人民群众

的活动历史是分不开的。近1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这样。我们党有这么多的合作者，是我们党的光荣。他们对革命、对党的贡献并不比有的党员少，有的人比党员的贡献还要多些。我们搞党史视野要放宽一点，要从四面八方来反映。这样，南方局的活动历史就具体了。

搞南方局的历史也要包括国民党谈判对手的情况。凡是与党的活动有直接关系的人，不管是什关系，只要是对党的活动有影响的，也都要充分了解和掌握。

三、关于“西安事变”和“重庆谈判”

乔木同志说：讲“西安事变”，过去的党史很少提到张学良的作用。他的作用是很大的。最近中央文献研究室办的刊物《党的文献》连续三期刊登了一篇文章《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对此作了详细介绍。我们党的政策，从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张学良起了很大作用。张学良向我们党介绍了蒋介石的为人。他说蒋介石很坏，对他非常刻薄，逼他放弃了东北，又把不抵抗的罪名加在他头上；但是，他又说蒋介石是要抗日的，当然蒋不放弃反共，他是反共抗日。张学良表示要劝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同时，张学良又建议我们党：要抗日不联蒋不行。他先对刘鼎说，后来又对周恩来同志说。这对于当时中央关于联蒋抗日的决策是有帮助的。这件事当然与南方局的工作无关，只是举例说研究党史要同时研究与党的工作有关的党外人士。

乔木同志说：对于“重庆谈判”、“停战谈判”、政协会议，我们党都是有诚意的，我们下了很大的决心，做了很多的工作，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方案，作了一定的让步。国民党蒋介石从根本上说是缺乏诚意的。但当时全国人民要求和平，国际上也不允许中国打内战。美国虽然支持蒋介石政权，但也

不赞成他马上同共产党打内战。美国的政策是矛盾的，但在当时，它的总方针还是希望中国不要爆发大内战。在某种意义上讲，美国的这种态度对蒋介石国民党决定同共产党谈判并在和平建国和停止内战等问题上取得一定的协议起了决定的作用。

四、开门办刊物，内容要丰富生动，不要单调

乔木同志说：你们的刊物^①可以反映的东西很多。内容要丰富一点，不要单调，要表现整个党的活动、革命活动，不限于南方局、红岩村的历史。当然也不能把党史搞成社会史。搞党的历史不能把党内党外分开，不能搞成只关在屋里开会，要搞得丰富生动，这样教育青年的作用会更好，否则读者就少了。总之，要开门不要关门。

① 指《红岩春秋》。

目 录

南方局的历史丰富了党的历史宝库	宋平(1)
党史是党和人民群众共同奋斗的历史	胡乔木(1)
谈南方局的两项历史功绩	力平(1)
略论南方局的伟大历史功勋	彭塞(15)
论“皖南事变”前后南方局的历史作用	王泓(24)
中共中央南方局加强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	徐振增(37)
试论“隐蔽精干”	胡康民(55)
“隐蔽精干”的决策与中共湖南省委的关系	唐振南(63)
对1939年南方局作出撤销“广西省工委”等项决定的探讨	吴忠才 张雨夏(75)
周恩来和国共谈判	吴瑞章(87)
“求同存异”——周恩来关于统一战线的唯物辩证法	王仁(99)
南方局与新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	郑洪泉(111)
略论周恩来为坚持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艺术和贡献	乔毅民(130)
继续和发扬南方局密切联系群众的历史经验	张迪明 刘兴全(138)
论“据点”	刘康(149)
南方局对抗战时期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影响和领导	彭承福 李蓉(159)

周恩来对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的领导	何盛明 罗宗明(169)
试论南方局对国统区文化界的领导	刘学良 李善贵(180)
面向世界：抗战时期之中国进步文化界	单翥风(193)
试论红岩精神	冯开文(205)
南京局和它的历史使命	陆庆良(217)
编后记	(230)

谈南方局的两项历史功绩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力平

抗日战争时期，南方局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机关，在重庆这一国民党统治的险恶政治环境中，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领导“大后方”的斗争，成绩十分辉煌灿烂，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谱写了重要的篇章。南方局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的历史贡献是多方面的，内容非常丰富。这里，我只谈一下其中的两项。

一项是，它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再一项是，它使中国共产党开始与世界相通，并为建国后的外交工作积累了经验，准备了人才。

一、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和政治协商制度打下了初步基础

1989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其中讲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长期革命与建设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民主革命时期，各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共同奋斗，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了重要贡献。”这里说的在民

主革命时期的合作奋斗，很重要的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南方局在重庆工作时期。从南方局的领导来说，周恩来的贡献最为突出。

我国的民主党派现在共有八个：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其中，除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外，绝大多数在建立或发展过程中都曾得到南方局的帮助或支持。有的，如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成立之前，南方局的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等经常同有关民主人士和党派接触，向他们讲解国内外政治形势，支持、帮助他们联合起来，才促使他们成立组织的条件趋于成熟。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创始人大多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左派，他们是最早的国民党民主派。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民主派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斗争不断，领袖人物有宋庆龄、何香凝等。“九·一八”后，他们赞成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抗战时期，在国民参政会内外，他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同南方局领导人合作。“皖南事变”后，宋庆龄、柳亚子等联名斥责蒋介石，柳亚子因此而被国民党开除。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影响下，国民党民主派酝酿建立组织。1943年8月，谭平山、陈铭枢、杨述、朱蕴山、王昆仑等筹备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联合会，后改名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1944年秋，中共代表在国民参政会上要求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后，冯玉祥、邵力子等500余人在重庆举行大会，要求改组国民党政府，成立联合政府，挽救危亡。1945年10月，“民联”第一次全体大会

宣布“主张中国国民党应立即自动结束党治，建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1946年3、4月间，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等筹建的另一个国民党民主派组织成立，定名“中国民主促进会”。1947年11月，冯玉祥在纽约成立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1947年11月12日，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在香港开幕。1948年1月1日选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推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何香凝、冯玉祥、谭平山、柳亚子、蔡廷锴等为常委。1941年在重庆由南方局领导下组成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小民革”）中不少成员成为“民革”的重要骨干。1948年，中共发布“五一”口号，李济深、何香凝、谭平山等都通电响应。后来，“民革”在北平、长沙、云南、新疆等地的和平解放以及筹备人民政协的工作中都做了不少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后，周恩来、董必武等在国民参政会内外向党外人士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此影响下，国民参政会中的部分参政员和有的非参政员组成了统一建国同志会。参加的有张澜、沈钧儒、黄炎培、江恒源、梁漱溟、邹韬奋、章伯钧、罗隆基、张君劢、曾琦、李璜等。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中外震惊，中国共产党反击了这股逆流，国内形势很紧张。在这情况下，上述人士感到统一建国同志会的组织太松散，不足以应付严重局势。于是，在原有组织基础上建立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这个政团同盟是1941年3月在重庆秘密成立的，由六个政治组织联合组成：青年党、国社党（后改称民社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亦称第三党，后改称农工民主党）、救国会、职教社和乡建派。它得到南方局的支持。由于在重庆不能公开活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派梁漱溟到香港去办一份报纸。

办报需要钱，需要人。梁漱溟找周恩来商议。周恩来表示大力支持。梁漱溟到香港办起了《光明报》。这张报纸是在中国共产党的财力、人力支持下办起来的，1941年9月18日在香港出版。10月10日，《光明报》公开宣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并发表了宣言和政纲。中国共产党就在10月28日延安的《解放日报》上发表社论《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给予支持。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改组为民主同盟。它响应中共建议，呼吁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各党、各派联合政权。1945年10月，民主同盟在重庆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选张澜为主席，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梁漱溟等为常委。他们在政治协商会议上以及后来的国共和谈和争民主、反内战斗争中都与中共代表紧密配合、互相支援。1948年1月，民主同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同共产党通力合作，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1948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五一”口号，民主同盟领导人发表声明拥护，并先后进入解放区，参与筹备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工作。

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于1945年12月16日。由黄炎培、杨卫玉、胡厥文、章乃器等所筹组，较早参加筹组的还有吴羹梅、胡西园、李烛尘、施复亮、孙起孟等。其成员主要是一部分爱国的民族工商业家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他们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是在南方局时期日益密切起来的。日本投降后，周恩来于1945年8月28日到重庆，会见过黄炎培；10月19日，应西南实业协会的邀请去作讲演，讲了《当前经济大势》，阐明中国共产党对工业的几个基本问题的意见。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期间，中国民主建国会联络各界组织“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在重庆较场口组织多次演讲会，

结果被国民党特务大打出手。1946年夏，为了争取国内和平，中国民主建国会在上海推派盛丕华、张炯伯、胡厥文、包达三、阎宝航会同马叙伦等赴南京请愿，到下关车站受到国民党特务殴打。国共和谈中，他们同中共代表团密切合作。1948年中共发布“五一”口号，中国民主建国会举行常务理监事会，一致决议响应。于这年11月派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代表“民建”到解放区参加筹备人民政协工作。1949年，“民建”还对解放上海作出了贡献。

中国民主促进会是1945年12月30日成立的。它的基本队伍一部分是马叙伦所联系的文教、出版界人士，一部分是王绍鏊所联系的上海部分工商界人士。他们中的很多人抗战前就同中国共产党一致呼吁团结对敌，共同抗日。抗战期间，又同南方局领导周恩来等经常保持联系，互相支持。1946年1月2日，中国民主促进会通过了《对于时局的宣言》，提出“改革政权，实现民主”，“国民党立即无条件地还政于民”等主张，同中国共产党相呼应。这年夏天，马叙伦等的赴南京请愿团遭到国民党特务殴打。以后，中国民主促进会积极参加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1946年11月15日，蒋介石不顾周恩来等的抗议和警告，悍然召开所谓“国民大会”并在12月25日通过“宪法”。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同“民建”、“九三”等发表声明，指出“国大”“不能为全国大多数人民及各民主党派所承认”，“这一宪法的产生基础及基本精神，彻头彻尾是反民主的、反政协的。”1948年，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口号一发表，中国民主促进会立即表示支持和拥护。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等先后进入解放区参加筹备人民政协的工作。

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发展历史也同南方局关系很深。1930年8月10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宣告正式成立，总